



人口与发展委员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2022年4月25日至29日

临时议程* 项目3(b)

一般性辩论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持久和包容的经济增长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人口与发展委员会在第2020/101号决定中决定，委员会2022年第五十五届会议的主题是“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持久和包容的经济增长”（见E/2020/25）。编制本报告旨在为委员会对该议题的审议工作提供参考。

秘书长在报告中解析了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重点是人口变化对宏观经济增长和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以及在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背景下对不平等和社会包容的影响。秘书长调查了部分人口模式和趋势与贫困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了妇女对一般家务劳动和直接照护的无酬贡献。此外，秘书长还审查了关于人口与环境可持续性之间存在联系的证据，包括人口增长作为气候变化驱动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 E/CN.9/2021/1。



一. 引言

1. 随着世界人口接近 80 亿，其增长速度继续放缓。1990 年代初，全球人口每年增长约 1.5%，而目前不到 1%，预计今后几十年里增长率将继续下降。在人口从高生育率和死亡率向低生育率和死亡率转型的后期，增速放缓很常见。
2. 由于转型的时间、变化速度和其他特征存在多样性，在全球造成了相当大的人口结构差异性。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人口快速增长，比较年轻，而在欧洲、北美以及东亚和加勒比部分地区，人口增长缓慢，相对较老。对后一类的一些国家，增长率现在是负数，即人口正在减少。
3. 人口变化的所有要素都受到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影响。截至 2021 年底，世界各国已报告有 540 万人死于该疾病。2020 年和 2021 年，一些国家的出生人数下降幅度超过预期，同时由于大流行病期间实行的旅行限制，国际移民人数的增长速度低于预期，甚至可能下降。除了这些短期影响，尚不清楚这一大流行病是否将对死亡率、生育率和移民的长期趋势产生影响。
4. 人口增长具有显著的内在惯性，因为它使人口趋于年轻化。因此，短期和中期的人口趋势很难通过公共政策来影响。尽管如此，利用人口预测和其他现有信息，各国政府可以预测人口结构趋势并为其后果做好准备。
5. 部分受婴儿和儿童生存率提高的影响，生育率下降，一旦开始出现这种情况，人口年龄分布的变化将成为经济增长的积极动力，前提是劳动力市场能够吸收迅速增加的工作年龄区间的人口。在这个人口结构转型的中间阶段，人口动态促进了人均收入和消费的加速增长，这通常被称为第一次人口红利。
6. 随着人口出现老龄化，第一次红利消失，第二次人口红利出现。人口老龄化会导致经济中的资本密集度增加，如果预计预期寿命延长、退休时间增加的个人相应地增加其资产积累，则资本密集度会进一步提高。¹ 单身者和子女较少的夫妇可以通过在一生中储蓄和积累财富，将更多的资源用于为老年生活做准备。
7. 生育率下降也有利于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妇女把更多时间用于受教育和有偿工作，因此可能会遇到更多、更好的经济机会。较小的家庭能够且往往会为每个孩子的健康和教育投入更多(见 [E/CN.9/2017/2](#))，这些投资也有助于实现持久和包容的经济增长。
8. 在人口结构转型初期，出生时预期寿命的提高主要是由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的下降推动的，导致较年轻人口的比例增加。在转型后期，预期寿命进一步的提高主要是由老年人死亡率下降推动的。虽然寿命延长和生活更健康带来了潜在的经

¹ Andrew Mason 等人，“抚养比和人口红利：世界估计数”，人口司第 2017/1 号技术文件(纽约，2017 年)。

济利益和个人机会，² 但寿命的延长加上生育率下降提高了老年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根据各国政府在向不同年龄组分配资源时所作的选择，这种情况可能会增加公共预算的财政压力。

9. 这种压力受到所有年龄段的经济活动和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减轻人口日益老龄化所导致的一些财政压力的常见办法之一是提高法定或官方退休年龄。³ 尽管这种变化从总体财政角度来看可能有好处，但也可能加剧与不同社会群体预期寿命差异相关的已有不平等。⁴

10. 在几乎所有社会中，公共部门在规划、管理和提供各种基本服务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这些服务包括卫生保健、教育、社会保护和公共基础设施，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受到人口年龄构成变化的影响。然而，公共部门并不是促进不同年龄间资源转移或其他形式资源重新分配的唯一机制或机构。市场和家庭网络也发挥着作用，而且它们也会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

11. 人口动态与社会包容相互关联。高生育率和人口快速增长仍然与贫困高发有关，而在处于人口结构转型早期和中期的国家更是如此。

12. 对于处于人口结构转型晚期的国家，人口逐步老龄化会导致资本密集度⁵ 提高，并可能加剧经济不平等，因为资产和资本所有权方面的不平等往往大于劳动收入方面的不平等(称之为“皮凯蒂效应”)。同时，卫生保健、教育和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和社会包容趋势也会影响人口结构趋势。⁶

13. 近几十年来，在减少性别不平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反映在教育成就水平和通过了防止家庭暴力的法律。然而，许多国家仍然存在歧视性立法和做法，不仅影响到教育，而且影响到就业、法律保护、享有服务和政治参与。经济增长要真正具有包容性，就必须为妇女和男子创造体面工作和生产性就业机会，必须承认和重视一般家务劳动和直接照护。

14. 虽然过去二十年来全球贫困大幅减少，但各区域的进展并不平衡，而且进展因这场大流行病而在全球中断。⁷ 这场大流行病对弱势社会群体产生了破坏性影响，扩大了国家内部和各国之间原有的不平等，包括在获得卫生保健方面的不平等。

²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2020-2030 年促进老龄健康十年”，2020 年 12 月；Jean-Marie Robine，“老龄化人口：我们活得更长久，但我们更健康吗？”，UN DESA/POP/2021/TP/NO.2，2021 年 9 月。

³ 联合国，“老龄化世界的人口结构趋势”，《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联合国经济学家网络报告：塑造我们时代的趋势》(联合国出版物，2020 年)。

⁴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The Growing Gap in Life Expectancy by Income: Implications for Federal Programs and Policy Respons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5).

⁵ 资本密集度的定义是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包括工人数量，经济中可用的资本数量。

⁶ 联合国(2020 年)，“老龄化世界的人口结构趋势”(见上文脚注 3)。

⁷ 《2021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联合国出版物，202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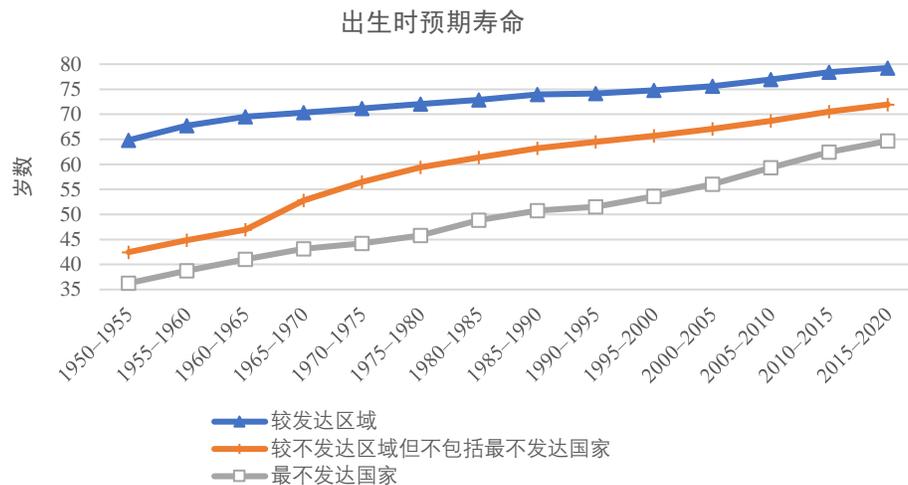
二. 人口趋势：趋同和差异性

15. 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的出生时预期寿命一直在趋同。在 1950-1955 年至 2015-2020 年期间，最不发达国家与较发达区域之间的差距几乎减半，从 29 岁降至 15 岁(图一上半部分)，主要驱动因素是儿童死亡率急剧下降。然而，仍然存在显著差异：最不发达国家的总死亡率与较发达区域 1950 年代的总死亡率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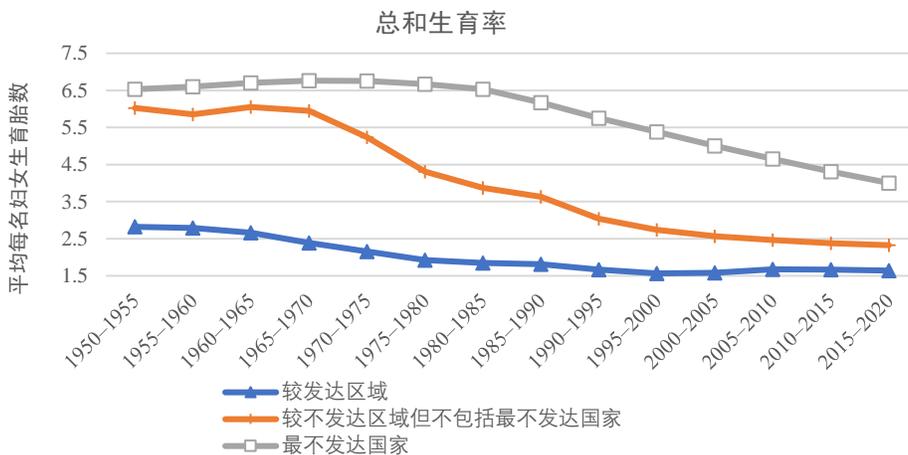
16. 最不发达国家与较发达区域的生育率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趋同，但平均差距仍然很大(图一下半部分)。然而，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外情况。例如，在人口最多的最不发达国家孟加拉国，1970-1975 年期间的总和生育率为每名妇女 6.9 胎，是人口最多的发达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的三倍多；到 2015-2020 年期间，这两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差距已缩小到每名妇女 0.28 胎。

图一

1950-1955 年至 2015-2020 年期间较发达和较不发达区域预期寿命和总和生育率趋势



资料来源：《2019 年世界人口展望》(联合国出版物，2019 年)。



资料来源：《2019 年世界人口展望》(联合国出版物，2019 年)。

17. 区域和地方在人口结构转型时间、速度方面的特质和其他特征，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相当大的人口差异性。较晚进入这一过程的国家增长迅速，人口年龄构成年轻，中位年龄在 15 至 19 岁之间。许多这类国家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较发达区域国家的生育率水平接近或低于每名妇女 2.1 胎的更替阈值，⁸ 人口即使增长也很缓慢，年龄分布也要老得多，中位年龄在 45 至 48 岁之间。这些国家的老年人口规模继续增加，原因是各年龄段的死亡率继续下降，包括老年人的死亡率。

18. 到 2050 年，高收入国家 65 岁或以上人口的比例预计将达到 27%，而在低收入国家，这一比例将保持在 5% 左右。然而，在某些类别的国家中，这些趋势将有一定程度趋同：例如，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

19. 此外，在健康状况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性。老龄化与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增加、认知功能下降和老年残疾增加有关，但这些问题对各国人民的影响程度不同。⁹ 总体而言，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因过早死亡或疾病而损失的生命年限要比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得多，特别是在老年人中。进行国家间比较的一项有用基准是在全球范围平均在 65 岁时年龄所致健康问题的平均流行率。日本人平均在 76 岁时达到类似的健康状况，¹⁰ 而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在 46 岁时达到同一基准。换言之，这两个国家代表国民达到全球平均 65 岁时健康状况的最高和最低年龄，之间有整整 30 年的差距。在认知功能方面也显示出类似差异，发展中国家的人总体得分较低。

20. 国际移民影响了一些国家的人口规模和其他特征。1990 年至 2017 年期间，西欧、北欧和南欧大多数国家的移民净流入量大于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的差额，因此，在这些国家的人口规模原本会下降的情况下，移民有助于确保人口持续增长。因为移民通常比目的地的人口年轻，移民还使这些社会比无移民的情况下略微年轻化。

21. 相比之下，中东欧许多国家在 1990 年至 2017 年期间出现了移民净流出。因此，在这一时期，在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的情况下，国际移民使人口下降更为严重。例如，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人口在过去三十年中下降了 25% 以上。

三. 人口、宏观经济增长和财政可持续性

人口与宏观经济动态

22. 在人口结构转型期间，生育率下降通常会导致工作年龄人口规模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暂时增加。这种变化在一定时限内为经济产出的加速增长提供了机会，即所谓的第一次人口红利。这一红利使人们能够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并对未来进行投资。

23. 在全球范围内，与第一次人口红利相关的经济增长助力在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期间达到最高，主要原因是东亚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人口结构趋势。在

⁸ 总和生育率的更替水平，即在低死亡率情况下每名妇女生育 2.1 胎，可确保长期的人口增长率为零。

⁹ Robine “老龄化人口”（见上文脚注 2）；André Cezar Medici，“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卫生部门的挑战和政策”，UN DESA/POP/2021/TP/NO.3，2021 年 11 月。

¹⁰ Angela Y. Chang 等人，“Measuring population ageing: an analysis of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7”，*The Lancet: Public Health*, vol. 4, No. 3 (2019)。

1950 年至 1975 年期间，生产力(每个工人的产出)的提高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然而，在上世纪最后 25 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多是由人口结构变化而非生产力提高所驱动。¹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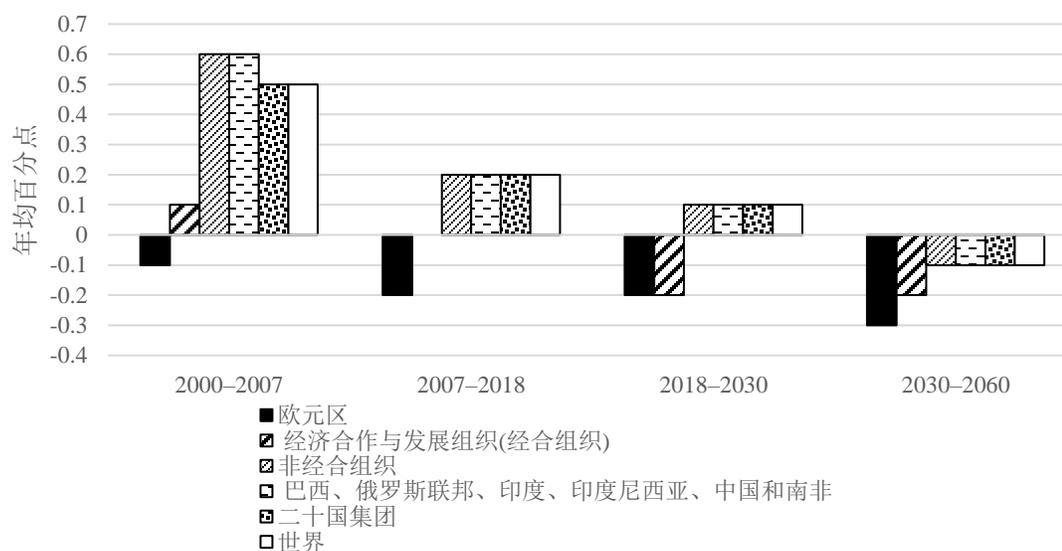
24. 第一次人口红利是由区域趋势推动的，这些趋势在时间、持续长短和规模方面都有所不同。在非洲，第一次红利期始于 1993 年，预计将持续 92 年；其累积影响将是人均收入额外增长 35%。在亚洲，预计红利也会使个人收入增加约 35%，但红利期始于 1975 年，预计将持续 58 年。¹²

25. 下一组数字说明了不同类别国家经济增长最近值和预测值，考虑到工作年龄范围内人口的比例以及其他关键经济变量。图二显示，在近期之前，只有欧元区国家由于工作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为负。

26. 图二所示的“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非经合组织)国家(见附注中的定义)由于到 2030 年(包括 2030 年)工作年龄人口比例增加，预计将对人均经济增长产生积极贡献，但这种影响预计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2030 年以后，预计对图二所示的所有国家类别，工作年龄人口比例的变化将对人均收入增长带来负影响。图三表明，对本分析所考虑的所有类别国家，未来的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资本密集化和劳动效率的提高。

图二

世界和部分国家类别的工作年龄人口比例变化对人均实际产出年增长的贡献
2000 年至 2018 年估计值以及 2018 年至 2060 年预测值



资料来源：Yvan Guillemette 和 David Turner，《长远观点：到 2060 年的世界经济情形》，第 22 号经合组织经济政策文件(经合组织出版社，2018 年，巴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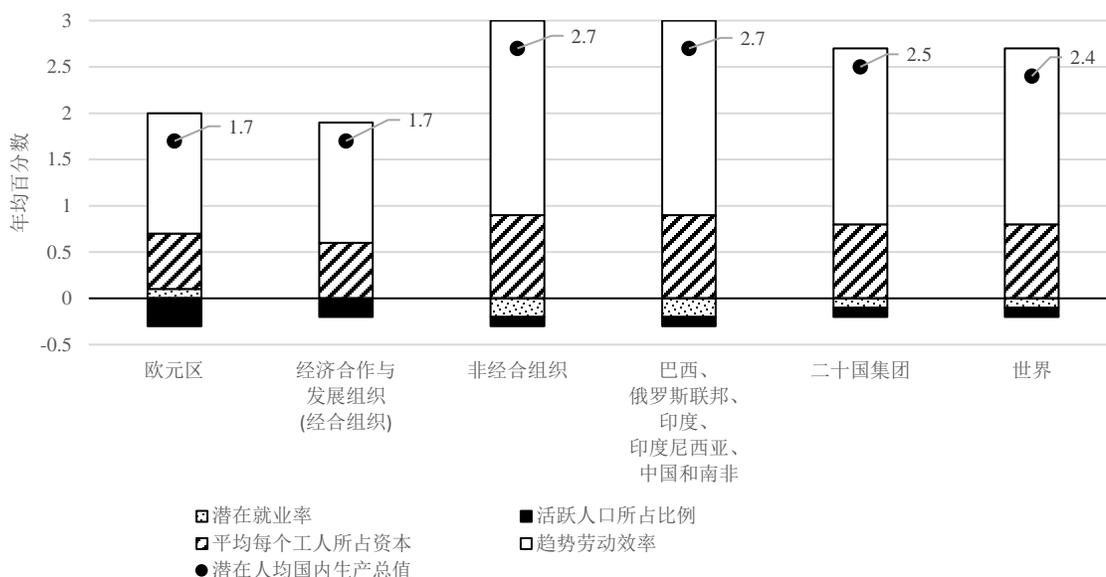
注：“世界”是指占世界总产出 82% 的 46 个国家。“非经合组织”是指巴西、俄罗斯联邦、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和南非以及阿根廷和沙特阿拉伯。

¹¹ Mason 等人，“抚养比和人口红利”(见上文脚注 1)。

¹² 对人口红利规模和时间的完整说明见联合国，“老龄化世界的人口结构趋势”(见上文脚注 3)。

图三

2030-2060 年世界和部分国家类别中四要素对人均实际产出年增长的预计贡献



资料来源：Guillemette 和 Turner，《长远观点》。

注：国家分类见图二及其附注。

27. 预计在未来几十年中，处于人口老龄化较严重阶段的国家的经济抚养比¹³将下降，这将影响到个人在不工作后如何为其消费提供资金。一些老年人，特别是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老年人，从资产中获得大量收入，因此较少依赖私人或公共资金转移。然而，在国家内部和全球范围内，这类人通常是富裕的少数群体。在养恤金制度覆盖面广、福利充足的国家，支持老年人消费所需的代际间资源流动主要或完全通过公共资金转移实现。

28. 此外，宏观经济受到国际移民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但不是所有情况下，国际移民会给来源国和目的地国带来好处。由于移民带来了早先获得的人力资本，来源国失去了对移民投入的回报，而目的地国则受益于生产和税收的增加。在某些情况下，高技能工人的移民也可能导致“人才外流”，可能导致来源国的生产力下降。例如，中东欧国家的移民对经济产生了各种不利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因移民而流失，对该区域各国的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和养恤金制度构成重大挑战。¹⁴

29. 尽管如此，来源国也可能从移民中受益，因为移民工人的生产力通常在目的地国更高，并获得更高的收入，移民往往通过向留在来源国的家庭成员汇款来分

¹³ 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的比率，见 Mason 等人，“抚养比和人口红利”（见上文脚注 1）。

¹⁴ Cristina Batog 等人，《Demographic Headwind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uropean Department Series, No. 19/12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9)。

享这些收入。移民来源社区还可受益于与跨国人口有关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返回的移民在国外获得的技能和教育。¹⁵

财政可持续性

30. 上文已经指出，随着社会开始人口结构转型，通常儿童和青年的存活率首先提高，工作年龄成年人的存活率也会小幅提高；然而，在预期寿命提高的情况下，随后的增长主要是由于老年人死亡率大幅度的空前下降。¹⁶ 如果标志着生命周期从活跃期转入非活跃期的年龄是固定的，那么平均寿命的逐步延长将提高每个工人支持老年人口的费用。对于处于这种情况的国家，除非提高平均退休年龄，否则公共预算的压力在未来可能会过高而不可持续。例如，欧洲联盟委员会 2021 年老龄问题报告¹⁷ 指出，卢森堡和斯洛伐克政府用于老龄相关方案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到 2070 年可能分别增加 10 个百分点。欧洲联盟国家公共支出的增长主要是在卫生保健和长期护理领域，教育支出的减少以及已经制定的平衡养恤金预算的改革建议或措施只能部分抵消公共支出的增长。

31. 公共债务也受到人口结构趋势的影响。例如，东亚正在经历非常迅速的人口老龄化，预计这将对该区域国家的公共财政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大韩民国的预算预计出现赤字，在相关政策和方案没有补偿性变化的情况下，净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预计将增加一倍以上，从 2020 年的 12% 增加到 2050 年的 29%。¹⁸ 在同样的情况下，日本的净公共债务预计将从 2020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75% 增加到 2050 年创纪录的 424%。应对这种情况的可选政策包括投资于终身学习、在各年龄段促进健康生活方式和提高官方退休年龄。

32. 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终身健康状况的改善有助于推迟与年龄有关的身体和认知功能衰退，使人们能够延长工作年限。例如，在中东欧一些国家，预期寿命和平均退休年龄的增加大致平行。在该区域的 8 个国家中，平均退休年龄在 15 年内增加了 3.5 年，从 2001 年的 58.4 岁增加到 2016 年的 61.9 岁，而平均退休年龄对应的剩余预期寿命几乎没有变化：2001 年为 20.6 年，而 2016 年为 20.5 年。由于老年人预期寿命的增加几乎完全被推迟退休所抵消，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的进一步老龄化并没有转化为对国家政府预算的额外压力。

33. 中东欧 8 个国家平均退休年龄的提高是退休人群的教育水平大幅提高促成的。2001 年，55 至 64 岁的人中有 37% 仅受过初中或以下教育；到 2016 年，这

¹⁵ Michael A. Clemens, “移民是一种发展形式：需要创新管理移民以实现互利”，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第 2017/8 号技术文件(2017 年)。

¹⁶ Karen N. Eggleston 和 Victor R. Fuchs, “The new demographic transition: most gains in life expectancy now realized late in lif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6, No. 3, (Summer 2012)。

¹⁷ 欧洲联盟委员会, *The 2021 Ageing Report: Economic and Budgetary Projections for the EU Member States (2019-2070)*, Institutional Paper, No. 148 (Luxembourg, 2021)。

¹⁸ S.-H. Lee、A. Mason 和 D. Park, “Aging and debt”, in *The Sustainability of Asia's Debt*, Benno Ferrarini、Marcelo M. Guigale 和 Juan J. Pradelli 编辑(即将出版)。

一比例已降至 13%。在同一时期，55 至 64 岁的人中，最高学历等同 *matura*、*Abitur* 或 *baccalauréat* 的人的比例从 49% 增加到 65%，而拥有大学学历者的比例从 14% 上升到 22%。在向知识经济过渡之后，更高的教育水平使更多人能够在年老时保持就业能力。

34. 然而，人力资本引起的老年人口就业能力的提高并不总是伴随着人们平均退休年龄的提高。在日本，寿命与平均退休年龄趋势之间的差异导致估计有 412 万老年工人成为“未开发的工作能力”，根据一种设想，他们的潜在劳动收入估计相当于 2015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3% 到 6% 之间。¹⁹ 调动老年人尚未开发的工作能力可以增加劳动力供应规模，帮助为养恤金和卫生保健系统提供资金，同时推迟养恤金的支付，从而减轻公共预算的压力。

35. 存在尚未开发的工作能力也可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政治机会，提高官方退休年龄，并对福利和缴款进行其他调整，以确保养恤金制度的长期可持续性。然而，在考虑提高退休年龄时，需要考虑一些重要的公平性问题。由于不同社会和经济群体的剩余预期寿命存在差异，一刀切地提高退休年龄将意味着，退休后生命年限的损失占总退休年数的比例对不同群体会有所不同。

36. 虽然公平作为养恤金改革建议一项考虑因素的重要性得到广泛承认，虽然已经提出一些理论上的补救措施，²⁰ 但在建立公平、政治上可接受的调整方案方面存在着概念和实际的挑战。在这方面，一些国家已经着手提高退休年龄，尽管可能对整个人口产生不平等的影响。美国在将官方退休年龄统一提高两年时，该国政府授权研究提高退休年龄对从事体力劳动或健康不佳的老年工作者的影响。²¹ 其他国家，如法国，根据工作的体力要求，不同工种有不同的最低退休年龄。²²

家庭支持网络

37. 除公共部门外，市场机构和家庭网络作为代际转移的提供者或代理人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历史、社会规范和技术。图四利用欧洲联盟的数据，说明了四种机制对每个年龄组消费的贡献。该图显示了家庭内部私人转移以及公共部门内部转移对支助儿童和青少年的突出作用。与之相对，欧洲老年人的消费资金几乎完全通过公共资金转移和来自自有资产的收入筹集。

¹⁹ Naohiro Ogawa 等人，“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three demographic dividends in Asia”,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vol. 38, No. 1 (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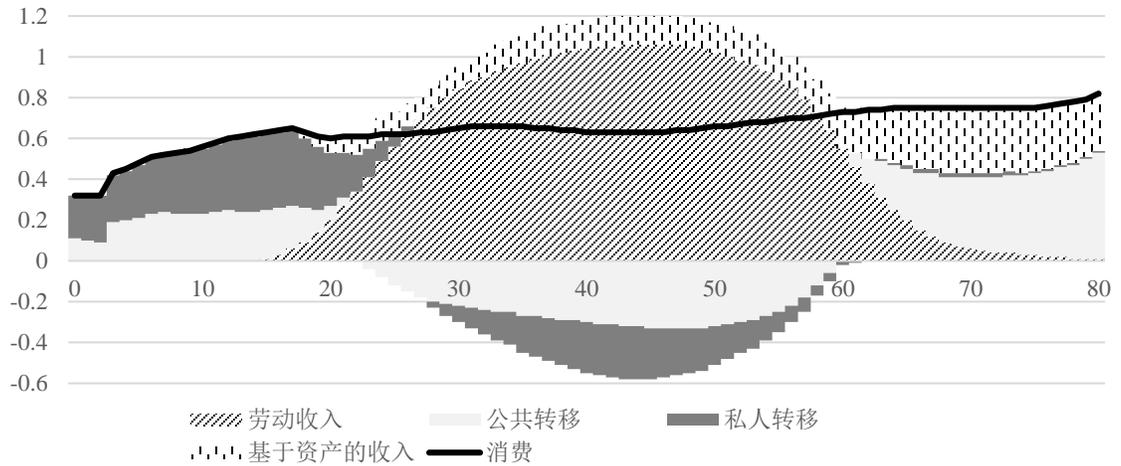
²⁰ Geoffrey T. Sanzenbacher 等人，“Calculating neutral increases in retirement age by socioeconomic status”, Centre for Retirement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015-22 (Chestnut Hill, Massachusetts, 2015);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The social security retirement age”, 2021 年 1 月 8 日。

²¹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creasing the social security retirement age: older workers in physically demanding occupations or ill health”, *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vol. 49, No. 10 (October 1986)。

²² 见 www.service-public.fr/particuliers/vosdroits/F2786。

图四

2010 年欧洲联盟按年龄分列的四种人均消费筹资机制(劳动收入、公共转移、私人转移和基于资产的收入)



资料来源：Tanja Istenič、Bernhard Hammer 和 Alexia Prskawetz, “欧洲国家(时间)转移账户”，见《2019 年维也纳人口研究年鉴》，第 17 卷，Bernhard Hammer、Ronald Lee、Alexia Prskawetz 和 Miguel Sanchez-Romero 编辑(奥地利科学院出版社，2019 年，维也纳)。

38. 家庭网络在提供个人护理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而且交易费用低。然而，单个家庭组成的风险池相对较小。虽然在许多国家，对老年人口的支助已逐渐转移到公共系统或基于市场的系统，但在所有国家，家庭仍然是支助儿童和抚养子女的主要机制。

39. 日本的数据揭示了各种不同年龄间转移渠道与不断变化的社会规范和期望之间的联系。在对日本已婚育龄妇女的定期调查中，受访者被问及对她们在老年时获得支助的个人期望。1950 年，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期望依靠子女。然而，随着医疗和养恤金计划覆盖面扩大，特别是在 1961 年这些计划普及后，此类期望开始削弱。今天，只有约 5% 的受访者期望在年老时依靠子女。同样，从 1960 年代初到 1980 年代中期，75% 至 80% 的受访者认为赡养年迈的父母是一种“优良传统”和“与生俱来的义务”。然而，这一比例在 1986 年公共居家护理服务推出后骤然下降了约 25 个百分点；从 1990 年到 2010 年，这一比例在 45% 至 50% 之间波动，2010 年后进一步下降到目前约 20% 的水平。

四. 人口、持久和包容的经济增长

40. 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不平等和包容性增长再次受到关注。根据定义，可持续性的一个核心目标是各代人之间和长期的公平，或至少不存在严重的不公平。如果可持续性意味着要避免跨时间的不平等，那么就很难为容忍当前极端程度

的不平等提供理由。²³ 这样一来，可持续性、公平和包容的目标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人口动态与社会包容

41. 研究人员经常将人口结构转型期间不平等的演变描述为倒 U 型。²⁴ 在转型的早期阶段，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生育率差异往往会增加，因为较高社会经济群体的人通常首先采取节育，这造成了生育率差异，可能会加剧其他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随着计划生育在各人口群体中的普及和使用，生殖行为的差异往往会缩小，从而缩小各社会经济群体之间的生育率差距。

42. 人口结构转型影响不平等的另一个机制是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资本密集度增加。由于资产总体比人力资本更集中，资产收入的分配比劳动收入的分配更不均。在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广泛资本积累以及税收制度的变化，导致自 1970 年代以来资产收入在个人和家庭总收入中的份额稳步增长，这与收入日益集中在最高收入者中有关。例如，1970 年至 2010 年期间，美国收入最高的十分之一的人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从 33% 增至 47%，在欧洲从 31% 增至 37%。²⁵ 人口增长放缓和人口老龄化加剧了这一进程。²⁶ 其他富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平等程度也在上升。²⁷

43. 不断变化的社会包容模式对人口结构趋势产生了影响。例如，在许多国家，获得卫生保健、教育和养老金的机会增加促成了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下降。生育率的下降反过来有助于改善卫生条件，扩大受教育机会，减少贫困的普遍性(见 [E/CN.9/2009/3](#))。

44. 然而，缺乏包容性仍然是许多国家的一个问题，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仍然非常不平等。要求扩大基本服务覆盖面或普及基本服务的若干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仍未实现，在某些情况下很难到 2030 年实现。例如，可持续发展目标(确保普及性保健和生殖保健服务)的具体目标 3.7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偏离轨道，需要加快进展才能到 2030 年实现。这一领域进展停滞或缓慢也可能会阻碍性别平等、教育和其他领域的进展。

²³ 罗伯特·索洛，“代际公平确实需要，但眼下的不公平该怎么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1996 年。

²⁴ Frank-Borge Wietzke, “Poverty, inequality, and fertility: the contribution of demographic change to global poverty reduc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46, No. 1 (March 2020).

²⁵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第 324 页, 图 9.8。

²⁶ Joshua R. Goldstein 和 Ronald D. Lee, “How large are the effects of population aging on economic inequality?”,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vol. 12 (2014)。

²⁷ 见 www.un.org/en/un75/inequality-bridging-divide。

性别、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数据

45. 对不平等的评估传统上是基于对家庭的分析和比较。随着性别不平等问题在全球发展议程中得到更多关注，在家庭一级衡量经济福祉和贫困程度的不足之处变得更加明显。标准的国家统计数字没有反映出无酬劳动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特别是一般家务劳动和直接照护。

46. 衡量无酬工作尽管存在固有的困难，但由于最近在性别统计方面的举措，衡量无酬工作取得了进展。这方面的例子包括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牵头的全球性别统计方案、计算妇女劳动量项目²⁸ 和世界银行性别小组。

47. 目前现有的数据表明，在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人中，妇女的比例略高。²⁹ 性别差异似乎在 20 岁出头至 35 岁左右的主要生产和生育年龄最为突出，此时妇女生活在贫困家庭的可能性比男子高两个百分点。造成这种差距的部分原因是大量妇女与孩子生活在一起但没有伴侣，而与之相比，没有伴侣的男子大多数生活在没有孩子的家庭中。

48. 有许多文献说明在福祉非货币层面的性别差距。例如，在许多较不发达国家，成年妇女的识字率低于成年男子，尽管随着年轻人群中女性入学率的上升，这种情况正在迅速改变。此外，在一些国家，女童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超过了男童。平均而言，妇女因有偿和无酬工作的双重负担，比男子更“缺乏时间”，而且她们不太可能拥有使她们经济独立的财产和其他资产。

49. 性别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典型的劳动分工，男子从事更多的有偿工作，妇女从事更多的无酬工作，包括一般家务劳动和直接照护。涵盖不同区域 18 个国家的“计算妇女劳动量”项目的数据表明，在一些国家，无酬工作的份额占总工作时间的一半以上，比例在约 30%到 60%之间。³⁰ 按市场工资估算的时间价值表明，在所研究的国家，无酬照护工作的总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12%到 55%。³¹

50. 花费在无酬工作上的时间的年龄分布因国家而异。如孟加拉国、印度和墨西哥等国每周家务劳动小时数的年龄分布呈单一高峰，集中在育龄妇女中(见图五)。在如德国和西班牙等其他国家，年龄分布呈双高峰，反映出照护工作集中在人生的两个阶段，一个与生育和抚养子女有关，另一个与照料老年配偶和孙子女有关。

²⁸ 见 www.countingwomenswork.org/about/who-we-a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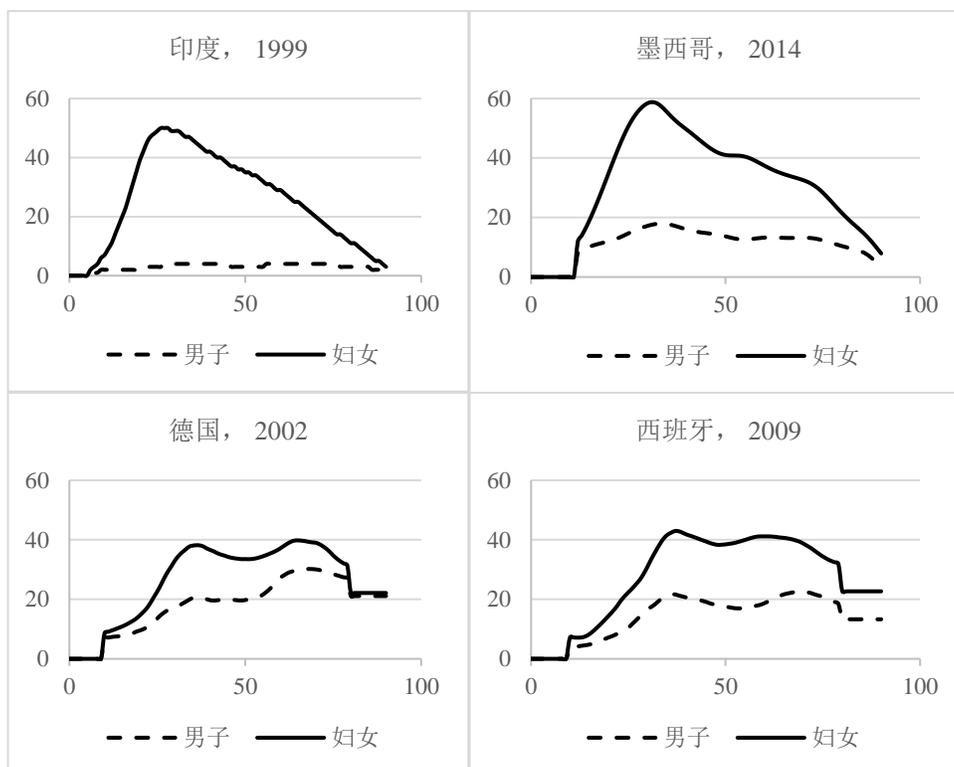
²⁹ Isis Gaddis, “Gender and age differences in poverty: measuring inequality within households”,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virtual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Popul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uly 2021.

³⁰ 见计算妇女劳动量项目汇编的结果，可查阅 www.countingwomenswork.org。

³¹ 计算妇女劳动量项目采用了一种新方法，即基于时间使用情况调查的国家时间转移账户，目的是(a) 将代表工作的活动与其他日常活动分开；(b) 给这些活动指定货币价值；(c) 确定该劳动所产出货物和服务的消费者。

图五

部分国家按年龄和性别分列的无酬一般家务劳动和直接照护工作量(每周平均小时数)



资料来源：www.countingwomenswork.org/data。

51. 儿童在这方面受益最大,因为在 18 个国家中,儿童平均每周消耗(接受)的无酬照护最多。相比之下,老年人的净时间转移(接受的时间减去给予的时间)仍然是负数,因为他们向其他人转移的时间往往超过接受的时间,这种情况直到高龄才改变。

社会包容与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

52. 尽管 COVID-19 加剧了各种类型的不平等,但在大流行病发生前全球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就在上升,目前处于创纪录的水平。³² 截至 2010 年代初,世界上几乎一半的财富由仅占 1% 的人口拥有,10 人中有 7 人生活在过去 30 年中经济不平等加剧的国家。³³ 不平等调整后人类发展指数是对标准人类发展指数根据指数

³² 开发署,《2020 年人类发展报告:下一个前沿——人类发展和人类世》(纽约,2020 年)。

³³ Oxfam, *Working for the Few: Political Capture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Oxfam Briefing Paper, No. 178 (Oxford,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2014).

各个组成部分(寿命、教育和收入)在一国内部的不平等程度调整后的指数，显示了由于不平等，全球人类发展水平平均下降了 20%。³⁴

53. COVID-19 之前的稳步减贫工作已经被这一大流行病造成的多重危机所打断，过去几十年来取得的大量进展也被逆转。世界上半以上的人口仍然得不到社会保护，特别是在非正规部门规模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自 COVID-19 暴发以来，超过 1 亿人陷入极端贫困，逆转了几十年的进展。然而，到 2030 年消除贫困的目标在大流行病之前就已经偏离了轨道，这反映了一直以来限制进展的更广泛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54. 除了 COVID-19 对死亡率的直接影响之外，大流行病对人口健康状况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不仅是 COVID-19 本身的直接影响。³⁵ 医院和门诊部取消了选择性医疗程序和手术，以减缓病毒的传播。这些取消大多减少了对非传染性疾病的治理，导致健康状况恶化，特别是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并导致与这些疾病相关的过早死亡增加。此外，由于采取了隔离和保持身体距离的措施，许多老年人容易患上精神疾病、遭受忽视和虐待。

55. 这场大流行病可能在多个方面加剧了性别差距。妇女占全球卫生和社会部门劳动力的 70%。此外，由于大多数家务劳动和直接照护由妇女承担，为防止病毒传播而关闭学校增加了妇女的负担，并限制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经济机会。³⁶ 来自 40 个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表明，在大流行病初期，妇女停止工作的概率比男子高 8 个百分点。³⁷

五. 人口、气候变化及环境可持续性

56.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进程往往造成环境损害，在关于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决定未顾及污染所造成损害等全部社会和环境成本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人口增长导致经济总需求增加，从而扩大了这种压力。

57. 随着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人口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人类活动正在导致地球气候变暖愈发显而易见，主要是因为提供推动经济发展的大部分能源的化石燃料正在增加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事实上，在累积的人为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其引起的全球变暖之间存在着近乎线性的关系。

³⁴ 开发署，《2019 年人类发展报告：超越收入、超越平均、超越当下——21 世纪人类发展历程中的不平等》(纽约，2019 年)。

³⁵ Medici, “Health sector challenges”(见上文脚注 9)。

³⁶ 联合国人口基金，“COVID-19：性别视角——保护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促进性别平等”，2020 年 3 月。

³⁷ Maurice Kugler 等人，《How Did the COVID-19 Crisis Affect Different Types of Worker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Jobs Working, “COVID-19：性别视角——保护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促进性别平等”，Paper, No. 6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21)。

58.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其题为“气候变化 2021：自然科学基础”的最新报告中，记录了每个区域和整个全球气候系统的重大气候变化。报告表示，科学家们对存在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这一事实没有争议。此外，最近变化的规模在数百年或数千年来前所未有，而且许多变化在类似的时间尺度上不可逆转，特别是那些影响海洋、冰原和全球海平面的变化。根据该委员会的数据，到 2019 年，地球平均气温已经比工业化前水平上升了约 1.1°C，迅速接近 2015 年《巴黎协定》确定的 1.5°C 的阈值。

59. 尽管几个世纪以来，化石燃料的燃烧一直在增加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但大部分排放发生在 1950 年以后，而且大部分是由今天的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贡献的。这两组国家加起来占世界人口的一半，对 2020 年大气中增加的约 85% 的二氧化碳负有责任。预计未来人口增长最多的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迄今对这些排放的贡献无论是按总量还是人均计算，都要小得多。

60. 在国家内部，收入与排放之间也有很强的关联性，因为富人的生活方式往往比不太富裕的人的生活方式更耗费能源。据估计，全球人口中最富有的 10% 占近一半的二氧化碳排放，仅最富有的 1% 所造成的年排放量就超过了最贫穷的一半人口的排放量。

61. 气候变化既可能扩大人类健康、粮食安全和社会条件保障等自然和人类系统的现有风险，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虽然世界上所有地区都将受到地表和海洋温度上升以及包括热浪、严重风暴和干旱在内的极端天气事件频率增加的影响，但全球变暖的负面影响将分布不均，对弱势群体和社区以及缺乏资源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的低收入国家来说，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大。秘书长在其题为“我们的共同议程”的报告(A/75/982)中提出了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融资的一揽子团结援助，其中包括每年提供 1 000 亿美元的目标，其中一半将分配给加强适应和抗御力以及提供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

62.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其报告中申明，人类行动仍然可以通过迅速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来改变未来气候趋势的走向。报告强调需要采取紧急行动，以减轻进一步的变化，避免出现严重和不可逆转的损害的情况。超过比工业化前水平高 1.5 摄氏度的阈值的风险迫在眉睫。正如该委员会明确指出的，必须大幅减排，到 2030 年减少 45%，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

63. 在努力实现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并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时，必须认识到，世界人口未来的合理轨迹范围相对较窄，在短期或中期更是如此。在今后 30 或 40 年内，全球人口增长的放缓速度似乎极不可能远超过联合国预测的速度。

64. 即使全球人口增长的速度在未来几十年继续下降，世界人口到 2050 年也可能比 2020 年增加 20% 至 30%。在这种情况下，气候变化的程度和严重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经济活动与二氧化碳排放脱钩的措施的范围和有效性，这些措施包括提高能源效率和从化石燃料转向零碳或低碳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核能以及与二氧化碳捕获和储存相结合的化石或生物能源。

65. 为了实现与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健康、教育、性别平等和体面工作等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远超过其人口的增长速度，这需要大幅扩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并在所有部门增加获得负担得起的能源和现代技术的机会。富裕国家和国际社会可以帮助确保这些国家获得必要的技术和财政援助，使其经济能够利用将未来温室气体排放降至最低的技术实现增长。

六. 结论和建议

66. 随着世界人口接近 80 亿，其增长继续减速；年增长率从 1990 年代初的 1.5% 左右降至目前的不到 1%。尽管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在增加，少数但不断增加的国家开始出现人口下降。

67. 人口预测可以帮助各国政府预测未来的人口结构趋势，并为其后果做好准备。有效利用这种预测可以按照《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的要求，促进将人口纳入发展规划。同样，秘书长在“我们的共同议程”中强调，必须加强理解和评估未来以及在政策和决策中树立长期思维的能力。

68. 生育率降低和人口增长放缓导致人口分布更加老龄化，根据各国政府在向不同年龄组分配资源时所作的选择，这种情况可能会增加公共预算的财政压力。在较发达区域的国家，与人口老龄化有关的财政压力多年来一直很明显，这些国家几十年来普遍生育率一直较低，各国政府用于老年人的人均支出高于用于儿童的人均支出。最近，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开始出现这种压力。

69. 在许多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社会保护的覆盖面和适足性有限。推广退休储蓄可以提高个人的财务独立性，增加资本积累。

70. 只有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迅速采取行动，应对重大挑战，包括经济不平等和社会排斥、财政和宏观经济失衡以及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退化，才能实现基于长期和代际角度的可持续发展。

71. 全球人口增长正在放缓，预计一直到 2100 年增长速度将继续下降。今后 30 年或 40 年，世界人口未来的合理轨迹范围相对较窄，表明在减轻未来几十年气候变化所构成的威胁方面，与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可能改变相比，继续努力限制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尽管如此，几十年来人口增长放缓的累积影响可能有助于减轻本世纪后半叶环境损害的进一步累积。

72. 较发达区域的国家历来对温室气体累积排放量的贡献最大，国际共识期待这些国家带头削减排放；这些国家的人口即使在增长也很缓慢，而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往往收入低、排放也低。

A. 采取代际视角

73. 敦促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在利用长期人口、经济和气候预测为建设包容、可持续社会的持续努力提供参考方面采用最佳做法。

74. 请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考虑采取具体措施，在国家和全球决策中顾及后代利益，例如设立未来问题的委员会或任命后代问题专员，负责就当前决定对未来民众的影响向政府和公共机构提供咨询意见，包括在持久和包容的经济增长方面。

B. 持续经济增长和财政可持续性

75. 各国应优先发展所有居民的人力资本，包括增加获得高质量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机会，同时考虑到目前和未来的技能要求和就业机会。

76. 各国政府应推广退休储蓄，确保从年轻开始工作时就能够普遍获得安全、负担得起、精算公平的金融投资，努力提高金融知识，并通过使用奖励措施和便捷注册备选办法，提供鼓励储蓄的奖励。³⁸

77. 各国政府不妨考虑根据老年人预期寿命的预期增长按比例提高退休年龄，以支持公共养恤金制度的财政可持续性和代际公平。与此同时，鼓励各国政府考虑社会群体之间预期寿命差异的影响，并探讨如何确保法定退休年龄的变化不会扩大现有的不平等。

C. 包容性增长

78. 各国政府在努力消除极端贫困时，应认识到人口变数与贫困之间的联系。例如，它们不妨承认，由于获得性保健和生殖保健，包括计划生育保健的机会增加，生育率以及儿童和孕产妇死亡率下降，也有助于减少贫困，实现持久和包容的经济增长。

79. 敦促各国政府采取积极步骤，使儿童和青少年继续上学，消除妇女加入劳动力和参与决策的障碍，促进男女更平等地分担家务和家庭责任，并在提供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社会保护时承认和重视无酬家务劳动和直接照护。

80. 鼓励各国政府扩大社会保护最低标准的覆盖面，制定政策措施，将社会保护扩展到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人，促进包括照护经济在内的企业和就业逐步正规化，并创建健全的金融架构，调动投资以支持体面工作、普遍的社会保护以及向公平和可持续经济的公正过渡。

D. 气候变化与环境可持续性

81. 各国政府应促进采取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包括选择资源消耗较少但更有营养的饮食，使用公共交通和节能电器，以减少人口的碳足迹。

82. 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产生了全世界 80% 以上的温室气体，而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受气候变化影响的风险最大。这两类国家应开展合作，以便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努力中加强气候行动。各国政府应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努力避免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最坏情况。

83. 敦促各国政府在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时，确保最弱势群体得到优先关注。

³⁸ 《2019 年世界人口老龄化：要点》(联合国出版物，2019 年)。

E. 将人口纳入发展规划和方案的证据基础

84. 敦促各国政府支持编制、传播和分析按年龄、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和其他相关特征分列的经济数据，需要这些数据促进对国内生产总值以外的福祉进行评估，并为设计惠及所有人口群体的持久和包容的经济增长政策提供参考。

85. 联合国应继续支持制定必要的证据基础和分析方法以评估妇女的全部经济贡献，包括无酬家务劳动和直接照护的贡献，并按国情酌情将这些评估纳入关于提供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社会保护政策以及在家庭内部分担责任的讨论和建议。